

《国朝赋楷》编者及选目考*

潘务正 桂 泉

《国朝赋楷》是一部清代赋学选本,选雍正初至乾隆二十三年之前赋 103 篇。然学界对其编纂情况尚缺乏必要的研究,亦未充分认识此书之价值。

一、编者考

《国朝赋楷》的编者,当今学界一般认为是沈德潜,其根据是南京图书馆所藏版本。此本六卷,收赋 103 篇。前有缺页,赋序起自“迦陵之绮绣”,中云:“予既因张君晋康之请,为选制帖诸诗以问世,又以诗赋原相表里,复请广选当今名札,另为专集。……于是搜采各家,共得若干首,注其目而卷之。”可知序的作者当为书的编者。序末署“乾隆戊寅(二十三年)春修楔后五日长洲沈确士题于山庄之酬隐堂”^①,“长洲沈确士”即沈德潜,南图据此著录编者,而学者提及该书也如此署名。笔者在编纂《沈德潜诗文集》时,亦将其视为沈氏所作^②。

《国朝赋楷》版本虽少,然并非仅南图有藏。国家图书馆亦藏有同名之作,所收赋完全相同(仅卷三陈华组《樵夫笑士赋》及汪由敦《日月合璧五星联珠赋》二篇有目无文)。不过国图著录编者却为“胡浚”,其根据也是卷首的赋序。此序内容与南图本完全相同,南图所残缺的部分,此本全。但此本赋序末署“乾隆戊寅春修楔后五日竹岩胡浚题于山庄之酬隐堂”^③,则编者不是“长洲沈确士”,而是“竹岩胡浚”,国图正是据此著录。

两种版本书名相同,收赋相同,赋序正文文字相同,而署名却完全不同,不免令人疑惑。《国朝赋楷》的编者究竟是谁呢?

如果将此书视为沈德潜所编,则存在着诸多疑问。一是此序未被收入沈氏《归愚文钞》、《归愚文钞余集》;其诗文中亦未提及此书;且是书在《沈归愚自

* 本文系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委员会直接资助项目“《沈德潜诗文集》整理”阶段性成果。

①《国朝赋楷》,清乾隆刻本,南京图书馆藏。

②潘务正、李言编辑点校:《沈德潜诗文集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1年,第2006-2007页。

③《国朝赋楷》,乾隆刻本,国家图书馆藏。

订年谱》中也未见任何记载。《年谱》对一生所编之书记载得特别详细,有的连起讫时间都很明确,如乾隆十九年甲戌云:“五月,评选《国朝诗别裁集》起。”二十二年丁丑云:“冬月,批选《国朝诗》毕。”甚至连其编纂的不太著名的《唐宋八家文读本》亦有明确载录,乾隆二年丁巳云:“批唐宋八家文。”但只字未提《国朝赋楷》。二是从选目、评语来看,亦有疑问。该书选入沈德潜赋3篇,仅次于齐召南4篇,分别是卷一《大猷礼成赋》、卷六《珪璋特达赋》与《白鹦鹉赋》,并且给予非常高的评价。如评《大猷礼成赋》云:“扬厉军容,极云屯雨洒之盛,引而归诸至道,此《上林》遗法也。其顿宕处尤不可及。”评《珪璋特达赋》云:“以撝金考石之宏才,扬鲁壁汉渠之精义,孔思周情,韶铎风蔚,兼而有之。”评《白鹦鹉赋》云:“描摹纯洁,非止肖状纤微,实寓言有在也,称生敏捷,固当逊以一筹。”这些评语显非自评其文者所为。即使评语非沈氏所加,但若为其所编,大概也不会如此多地入选己赋。三是序末所署“长洲沈确士题于山庄之酬隐堂”与事实不符。沈氏有归愚斋,另有教忠堂,笔者收集沈德潜资料时,并未发现他有“酬隐堂”。且署名方式也不符合其习惯。沈德潜晚年作品一般署“长洲归愚沈德潜”,而非以“确士”之字行。

那么胡浚是否符合编者的条件呢?署名中之“竹岩胡浚”,阮元《两浙輶轩录》卷一五有传。胡浚字希张,号竹岩,浙江会稽人,著有《绿萝山庄诗集》。另考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八四,胡浚还著有《绿萝山庄文集》二十四卷,南京图书馆有藏,刊刻于乾隆二十一年(1756)。集中所收均为骈体,未收入这篇作于两年后的散体赋序,所以不能据此否定胡浚为《国朝赋楷》的编者。

从《国朝赋楷》的选目来看,其中所选多为当代名公巨卿之作,但也收录了一些名气不大者之赋,诸如刘大观《雕鹗离风尘赋》、刘大申《白燕赋》、刘文蔚《笔花赋》、吴修道《秋水赋》。考阮元《两浙輶轩录》卷二八,刘大申字来岳,号柳村,山阴诸生,正谊子,著《柳村自鸣集》;刘大观字岩雨,号达夫,山阴岁贡生,正谊子,大申弟,著《鞠塍诗集》;刘文蔚字伊重,一字豹君,号栢亭,山阴优贡生,正谊第三子,著《石帆山人诗集》。三人为昆仲,西园十子中人^①,“西园社中有三刘之目”^②。其父名刘正谊。三人之所以能入选,一种可能就是与编者关系密切。翻检胡浚《绿萝山庄诗集》卷一五《怀人杂咏》,其中所怀之人有“刘宛委戒谋”,其下小注云:“山阴岁贡,越东诗巢七子之一,有《宛委山人诗集》。”^③阮元《两浙輶轩录》卷二八“刘大申”条后引《越风》云:“柳村为宛委先生冢子。”^④刘大申为“宛委先生”之子,则宛委山人刘戒谋即刘正谊。胡浚不

①潘衍桐:《两浙輶轩续录·补遗》卷四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687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2年。

②阮元:《两浙輶轩录》卷二八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684册。

③胡浚:《绿萝山庄诗集》,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集部第268册,齐鲁书社,1997年。

④阮元:《两浙輶轩录》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684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2年。

但作诗怀之,还为其作《刘戒谋宛委山人诗集序》,显然与刘氏有非同一般的交谊。又《绿萝山庄文集》卷一六有《刘豹君古学试帖小序》一文,刘豹君即刘文蔚,文中云:“鲤庭眉白,最三赅以尤良。”^①所谓“三赅”即刘氏三兄弟,说明胡浚很欣赏他们,将其比作“马氏五常”。至于吴修道,山阴人,与胡浚同乡;曾荐举博学鸿词,“以亲老辞”^②,又与其志趣相同。从这些层面看,《国朝赋楷》入选诸人赋作就容易理解。

此外,《绿萝山庄文集》卷一七有《绿萝山庄记》一文,可知胡浚有一座名为“绿萝”的山庄,则赋序署名中“题于山庄之酬隐堂”之“山庄”二字就有了着落。

以上种种证据说明,胡浚与此书关系非同一般。进一步研究,则会发现有更充分的证据证明编者为胡浚。《国朝赋楷序》中云:“予既因张君晋康之请,为选制帖诸诗以问世,又以诗赋原相表里,复请广选当今名札,另为专集。”即在此书之前,编者还纂有“制帖诗”之类的诗选,此事《沈归愚自订年谱》中亦未提及。而考胡浚著述,其中就有《历朝制帖诗选同声集》十二卷,南京图书馆有藏。书前有齐召南作于乾隆丁丑即二十二年的序,中云:“会稽胡竹岩先生博通好古,同里张君晋康,年友海门先生难弟也。请选唐人试帖,下及累朝诸篇,别类分门,详审笺注,以付开雕。”^③齐序所言与《国朝赋楷序》一致,这也是《国朝赋楷》的编者为胡浚的铁证之一。

在南图《历朝制帖诗选同声集》之后,还附有编者另一种著作,即《国朝赋选同声集》四卷。前有齐召南与胡浚二序,齐序开篇云:“竹岩胡先生以凤学伟才,评选古今试帖诗,嘉惠来学,一时风行,纸价倍贵。复谓赋与诗并,前代所传《赋汇》备矣,乃专录国朝儒臣应制馆课,类次笺释,颜以‘同声’,介予门人吴青于请序。”^④所云吴青于,即吴凤翥,与冯国泰同校此书,该书卷一下有标注。再核对此书胡序与《国朝赋楷》胡序,竟为同一篇文字,均为手写,字迹行款完全一致;与沈序也仅署名不同。由此完全可以证明,《国朝赋楷》最初名为《国朝赋选同声集》,编者不是沈德潜,而是胡浚。

据江庆柏先生研究,胡浚生于康熙二十六年(1687),其根据是《绿萝山庄诗集》卷三一《七十自述》^⑤。然胡浚此诗并未说明自己的生年,江先生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,可能是看到此诗后有一首《丙子南窗试作》,丙子即乾隆二十一年,从而断定本年为七十岁,由此推出胡氏生年。不过此书卷三〇中有《乾隆廿二年驾幸浙江二月廿四日臣浚恭迎于王江泾进呈排律六十韵》一诗,末卷即卷三二最后一诗为《送晋陵庄阁学典试还朝兼归省一百二十韵》,庄阁学即内

①胡浚:《绿萝山庄文集》,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集部第269册。

②阮元:《两浙輶轩录》卷三〇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684册。

③胡浚:《历朝制帖诗选同声集》,清乾隆刻本。

④胡浚:《国朝赋选同声集》,清乾隆刻本。

⑤江庆柏:《清代人物生卒年表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5年,第552页。

阁学士庄存与,乾隆二十一年出任浙江乡试考官^①,则此诗作于是年。诗的编排顺序虽有些混乱,然大概可知乾隆二十一年时胡氏七十岁,江先生所推生年大致不差。至于卒年,江先生未考出。其实孙人龙在为《绿萝山庄诗集》所作序中即已点明,序云:“窃意抵戴山后,道德文章,互相砥砺;不意岁戊寅,则已召赴玉楼矣。”则其逝世当在乾隆二十三年戊寅(1758)。本年孟秋齐召南为《绿萝山庄诗集》作序时尚未提及此事,可知胡浚当在是年秋后辞世。

二、作伪考

《国朝赋楷》经历了由胡浚《国朝赋选同声集》至沈序《国朝赋楷》的演变过程。

根据版本比对,胡序《国朝赋楷》(以下简称《赋楷》)是在其《国朝赋选同声集》(以下简称《赋选》)基础上改编而成的。二书选赋数量、排列顺序完全相同,版本也一致,均为页九行,行十九字,单鱼尾,字体也完全相同。二者区别在于,一是卷数不同。《赋选》为四卷,《赋楷》为六卷。《赋选》自余栋《正大光明殿赋》至叶观国《秋狩获白鹿赋》等10篇为卷一,《赋楷》同。自齐召南《竹泉春雨赋》至汪由敦《瑞雪赋》等31篇为《赋选》卷二;而《赋楷》至沈志祖《九月授衣赋》断开,将此卷一分为二:此前13篇为卷二,此赋及以下18篇为卷三。《赋选》自韩彦曾《躬耕藉田赋》至邵嗣宗《以乐为御赋》等33篇为卷三;《赋楷》亦是将此卷一分为二:戈涛《吹竹象凤鸣赋》以上19篇为卷四,此赋及以下14篇为卷五。《赋选》卷四29篇即《赋楷》卷六。二是版心有所不同。《赋选》鱼尾上方标注“同声集”,下方标注卷数与“赋选”二字;而《赋楷》鱼尾上方标注“国朝赋楷”,下方仅标注卷数。

由《赋选》到《赋楷》,并没有费太大工夫,只是采取两种方式。一是在目录中增补修改卷数。《赋楷》在《九月授衣赋》“九”字上加横排“卷三”二小字;将《赋选》卷“三”改为卷“四”;在《吹竹象凤鸣赋》“吹”字上加横排“卷五”二小字;将《赋选》卷“四”改为卷“六”。二是改动正文中版心的书名及卷数。《赋选》除正文开篇在赋题之前有“国朝赋选同声集卷一”外,其他每卷前均无,只是在版心标明。这样一来,《赋楷》只要将“国朝赋选同声集”改为“国朝赋楷”,并相应改动版心书名卷数即可。

《赋楷》分割《赋选》之后,每卷收赋数量趋于平均,否则《赋选》最少一卷仅收赋10篇,而最多一卷则有33篇。《赋楷》重新划分卷数之后,除最后一卷稍多外,其余五卷数量都比较均衡。

沈序《赋楷》与胡序《赋楷》版本基本相同。二者只有一处相异,即胡序《赋楷》正文开篇为书名及编纂人员信息。沈序《赋楷》则将这些显示书名及参与编纂人员信息的字样全部删去,正文第一行即为《正大光明殿赋》的标

^①法式善:《清秘述闻》卷六,中华书局,1982年,第195页。

题。显然,这样一改,就将编者由胡浚转变为沈德潜了。

谁会作这番改动呢?首先不可能是胡浚及其后人。胡浚在完成此书后即托吴凤翥请其师齐召南作序,企图借助名人扩大影响,且在此书完成之后不久即辞世,没时间也没必要改。胡氏门生及后人也不可能篡改。其次也不可能是沈德潜及其门生后人所为,试想沈氏编有《唐诗别裁集》、《古诗源》、《明诗别裁集》、《清诗别裁集》与《唐宋八家文读本》等,前四部刊刻不久即风靡一时,没有必要再将别人的著作据为己有。而且乾隆二十三年之后,沈德潜虽然致仕归家,但声闻正如日中天,处在这种地位,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来。

既然如此,只有一种可能,即篡改乃书商所为。《历朝制帖诗选同声集》及《赋选》最初由杭州敷文书院刊刻,书商为了营造声势,在扉页书名上方均标有“两浙窦大宗师鉴定”,并盖有红色印章“礼部颁行”四大字。然在此声势下,两部书命运似乎迥然不同:因乾隆二十二年乡会试改表、判为试帖诗,《历朝制帖诗选》应时而生,于是产生如齐召南所云“一时风行,纸价倍贵”的市场效应。而《赋选》则逊色许多,毕竟乡会试不考赋,且胡浚也非当时达官显宦,受此限制,购买者的数量显然比不上前者。为了使这部书有个好的发行量,书商选择两种做法:一是伪托名家鉴定,二是托名要人编纂。

先看前者。《国朝赋选》扉页“两浙窦大宗师鉴定”之语已足见书商的用意。这位“窦大宗师”即窦光鼐,乾隆二十二年以内阁学士任浙江学政^①。胡浚完成此书后可能呈给他审阅,或许窦光鼐将此进呈礼部,才有“礼部颁行”之印,所以书商才大肆渲染。但此举似乎并未达到预期效果,书商便伪托影响更大的人物,此人就是沈德潜。据笔者调查,现存《国朝赋楷》还有一个版本。《三秦都市报》2006年4月15日有篇名为《家藏乾隆年古书30年不知其价》的报道,一位化名为宋吉祥的市民拿着一本古书请记者辨认,记者翻开首页,“正中用楷体字工工整整地写着‘国朝赋楷’四个大字,上方写着‘乾隆三十年卷’,左上角写着‘长洲沈确士鉴定’,右下角写着‘怀德堂梓行’”。“共六卷八本,书中用赋文体详细记录了乾隆皇帝在1752年至1753年间出巡全国的大事记,从目录上看到,全书记载‘九日登高赋’、‘大狩礼成赋’、‘凤鸣朝阳赋’等近百篇文章”。所提到的三篇赋南图本、国图本均有,可见内容应无太大出入。只是乾隆皇帝出巡的记载则为此本所独具。据此报道,沈德潜仅是该书的鉴定者,而非编者。笔者曾试图与“宋吉祥”取得联系,不过由于种种原因,一直没有机会翻阅此书。然据此可以看出,乾隆三十年(1765)此书由怀德堂付梓时,即已在显赫位置标明“长洲沈确士鉴定”,显然是书商借助其名气而为。

再看后者。将此书著作权归于沈德潜,无疑能提高其声誉,扩大发行量。自乾隆四年(1739)沈德潜中进士,改庶吉士,直至其去世之后的乾隆四十三年(1778)“《一柱楼诗》案”发,其间沈德潜一直受高宗的优宠。生前屡迁官位,

^①法式善:《清秘述闻》卷一〇,第333页。

声名显耀;死后立碑赐谥,荣极一时。同时,如前所述,沈氏之《古诗源》及三朝诗《别裁集》早已风行一时,如将《国朝赋楷》托名于操文坛牛耳的沈德潜,不但符合其喜好编纂的作风,且能扩大影响。这种情况当时并不仅此一家,乾隆时吴江顾有孝编《古学精华》一书,扉页即署“长洲沈确士先生辑”^①,其实此书与沈氏并无关系,而托名于他,显然是为了抬高身价。《赋楷》沈序署名处没有挖改的痕迹,且“长洲沈确士”五字与整篇序的字体完全一致;开卷删去编纂人信息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,明显是在刊板上做的手脚。而篡改得如此干净,显然只有掌控书板的书商才能做到。

三、选目考

《国朝赋楷》之所以伪托沈德潜所编,且一直没有遭到学者的怀疑,与其选目有很大的关系。

《国朝赋楷》的选目,齐召南云是“专录国朝儒臣应制馆课”,儒臣即翰林官,馆课即庶吉士在翰林院庶常馆中学习三年时平常所试之作。《赋楷》中很多篇目后注明作品创作背景,其中一类就是馆课,如沈德潜《大狩礼成赋》、叶观国《秋狩获白鹿赋》、蒋麟昌《中和节进农书赋》、沈志祖《九月授衣赋》、储麟趾《九日登高赋》、王锦《十月纳禾稼赋》、陈桂州《黄钟养九德赋》、饶学曙《三鹵吹箫赋》、陆秩《砥砺廉隅赋》、江声《恭观御刻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赋》、徐玮《握金镜赋》、邵嗣宗《以乐为御赋》、储麟趾《黄目上尊赋》、叶观国《壶中九华赋》、宋弼《莺啭皇州赋》、邵嗣宗《春蚕作茧赋》、杜若拙《白受采赋》、孙汉《损先难而后易赋》等。有些虽没有标明,但据考也是馆课。如卷三《斗为帝车赋》,作者陈大化为乾隆十三年戊辰科庶吉士,法式善《同馆赋钞》卷四收录的此科馆课中即有此赋^②;卷五《清篆赋》,作者谢墉为乾隆十七年壬申科庶吉士,法式善《同馆赋钞》卷六收录的此科馆课中即有此赋;卷六《凤鸣朝阳赋》,作者钱维城为乾隆十年乙丑科庶吉士,法式善《同馆赋钞》卷三收录的此科馆课中第一篇即为此赋;卷六《木鸡赋》,作者福明安为乾隆十三年戊辰科庶吉士,法式善《同馆赋钞》卷四收录的此科馆课中即有此赋。另有一些赋作虽在法式善《同馆赋钞》中未直接查到,但根据其中保存的同馆中人赋作,也可推断为馆课赋。如卷一《诗礼堂进讲赋》,作者宋弼为乾隆十年乙丑科庶吉士,考法式善《同馆赋钞》卷三收录的此科馆课中有王际华同名赋,可证宋弼此赋当为是科馆课;卷六《书三昧赋》,作者邵祖节为乾隆十三年戊辰科庶吉士,考法式善《同馆赋钞》卷四,收录的此科馆课中有汪廷璵同名赋作,可知邵氏此赋亦为是科馆课。这六篇赋编者虽未注明,但为馆课之作无疑。其他限于文献记载不可考知的可能还有,足见馆课在《赋楷》中占据很大比重。

①顾有孝:《古学精华》,西湖常庆堂刊本。

②法式善:《同馆赋钞》,清光绪十六年(1890)刻本。

馆课外,《赋楷》中还收录了为数不少的散馆与大考之作。所谓散馆,即庶吉士三年学习期满举行的毕业考试。《赋楷》卷三戈涛《孟冬时令赋》后标注云“散馆一等三名”、卷五张裕荦《鼓琴得其人赋》后注云“散馆第二名”等即是。另外,卷四李因培《五位相得赋》虽未注出,也是散馆所试,考法式善《同馆赋钞》卷二“散馆卷”,乾隆十年乙丑科散馆,李因培一等一名,所试正是此赋。陈大谰《舜有羶行赋》后注仅云“二名”,而考顾有孝《赋苑精华》卷四,有陈氏此赋,注云“散馆第二名”,则亦属此类。大考是帝王为了甄别翰林院官员的才品,不定期举行的考试。《赋楷》卷二窦光鼐《纳凉赋》题后注云:“御试第二名。”考法式善《同馆赋钞》卷一“大考卷”,乾隆十七年大考试此赋,汪廷璜、窦光鼐、朱珪名列前三。则此云“御试”即是大考。另外,《赋楷》卷二齐召南《竹泉春雨赋》后注云:“乾隆戊辰,试翰詹诸臣于乾清宫,即以御笔所画竹泉春雨图为题。”考法式善《同馆赋钞》卷一“大考卷”,乾隆十三年戊辰大考,即为此赋,齐召南名列一等第一。

《赋楷》中还有几篇赋后注云“进呈”,如卷一钱大昕《圣驾南巡赋》、卷四陈鸿宝《放鹤亭赋》即是。钱赋后编者注云:“邸钞:乾隆十六年圣驾南巡。”说明此赋进呈于是年。乾隆南巡,江浙士子迎銮进献诗赋,命各省学政甄别后,对合格者加以考试,取中一等者授职内阁中书,此即召试。考十六年钱大昕参加了江南召试,陈鸿宝参加了浙江召试,此二赋则为他们迎銮时进呈之作。另《赋楷》卷六王又曾《无逸图赋》后注云:“钦试一等三名。”考此次南巡召试,浙江取中一等一名为谢墉,二名为陈鸿宝,三名即王又曾,赋题正是《无逸图赋》^①,则此“钦试”即召试。另,卷三《樵夫笑士赋》的作者陈华组,于乾隆二十二年参加浙江召试取中一等二名,此次赋题虽非此题,但可能为进呈之作,所以也被收录。

此外,《赋楷》卷七黄遇隆《披沙拣金赋》与《松柏有心赋》后注云“会课”,当是学校或书院考课之作。黄氏乾隆七年壬戌科庶吉士,二赋应作于中进士前。

由上可见,从创作背景明确的赋来看,《赋楷》所收多为翰林院试赋之作。其中所涉及的翰苑词臣,最早为雍正二年甲辰科庶吉士周长发、吴龙应,最晚为乾隆十九年甲戌科庶吉士平圣台,共72人,而《赋楷》收录的赋家仅79位,可见词臣占的比重之大。就此来看,齐召南云是书“专录国朝儒臣应制馆课”,大致不差。次于翰苑考赋的为召试献赋、试赋之作。胡浚自叙云:“搜采各家,共得若干首,……玉堂之染翰,黄阁之窜卷,灿如略备。”其中“玉堂”指翰林院,《赋楷》所收词臣之作中众多未注明创作背景的赋,应多与翰林院相关。如卷一窦光鼐《圣驾南巡赋》,注云:“邸钞:乾隆十六年圣驾南巡。”考窦氏乾隆七年进士,改庶吉士,散馆授编修,此赋为其詹事府左中允任上所献。又,从评语中也能看出一些赋为翰林应制之作。如评官献瑶《五声听政赋》云:“堪为应制

^①高晋:《南巡盛典》卷七七《饷俊》,沈云龙主编《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初编》第65辑。

楷模。”评王绂《仁寿镜赋》云：“一纬一经，若歌若颂，自是颺拜正音。”二作未注明创作背景，但从这些评语中亦可看出其为应制无疑。“黄阁”指内阁中书，召试一等者授此职。编者心仪此二类赋，尽管《赋楷》也收录了黄遇隆会课赋，及刘大观、刘大申、刘文蔚、吴修道之作，但总体来说比重很小。

《赋楷》收录之赋多为翰林应试与应制之作，这也与胡氏《历朝制帖诗选同声集》所收体类相近。“制帖诗”即应制诗与试帖诗，《赋楷》收录则为应制赋（迎銮进呈、词臣献赋等）与应试赋（翰林院馆课、散馆、大考及召试等试赋）。但《诗选》所选为历代及本朝之作，而《赋选》则限于“国朝”，则是因为“前代所传，《赋汇》备矣，乃专录国朝儒臣应制馆课”。《赋汇》即陈元龙《历代赋汇》，此书收赋上自先秦，下迄明末，所以胡氏有憾于“海昌所辑，既自启、祜而止，后此又无续纂”，乃选本朝之赋以弥补。不过胡氏如此抉择，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，即他认为本朝赋成就媲美汉唐，可以为今人法，《赋楷序》云：“甲辰、丁未两选鸿博，《璿玑》、《五六》两题，均依唐人试格，若愚山之雄健，迦陵之绮绣，竹垞之洁，彭羡门、毛西河之典雅秀拔，麟麟炳炳，各能于杨、左诸家外别营杼轴，为一朝巨制。嗣后廷试馆程，日研月渍，法愈密，材愈富，其旁搜冥抉，蒙茸焯燿之长，又直驾三唐而上之。”既然康熙十八年、乾隆元年两科博学鸿词诸公所作之《璇玑玉衡赋》、《五六天地之中合赋》“为一朝巨制”，且翰林院试赋之作又能“直驾三唐而上之”，那么士子学习作赋，取为楷模的不再是唐赋，而是本朝馆阁诸公之制。在《赋楷》中，编者给予本朝赋以极高的评价，如评余栋《正大光明殿赋》云“在律赋中是为特创之格”；评窦光鼐《圣驾南巡赋》云“此《三都》《两京》以后所仅有者”；评汪由敦《日月合璧五星联珠赋》云“非班、扬以下所能也”；评平圣台《象环赋》云“更胜马迁”，等等。这与《古学精华·凡例》所云“翰苑名家无难超马、扬、轶荀、宋”之观点一致。清代中后期赋论家张扬“去唐律而尚时趋”^①，自乾隆中期以后，士子不再完全以唐赋作为楷模，而是转向师法本朝馆阁试赋。《赋楷》选赋评赋体现的正是这种观念，从其出现的年代看，在清代赋史上具有先导意义。

正因《国朝赋楷》主选馆阁赋，而胡浚又无翰苑经历，所以缺乏说服力。沈德潜则符合这个条件。沈氏于乾隆四年选庶吉士，馆课曾获得第一名，又以第四名散馆，八年晋翰林院侍讲学士。此后他与乾隆帝君唱臣和，屡蒙嘉奖，声誉日隆。因此，将《国朝赋楷》这部馆阁色彩非常浓厚的著作托名于他，无疑会收到畅销之效。书商的这一经营策略，给《国朝赋楷》蒙上了层层迷雾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潘务正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
桂 泉 北京大学中文系

^①徐光斗：《赋学仙丹·赋学秘诀》，清道光四年（1824）刻本。